

◀ (上接6版)

国艺术史学界的明日之星。1955年,25岁的方先生便与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博士(Sherman E. Lee,1918—2008)合写专书,介绍该馆所藏的名画 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溪山无尽图》)。方先生以一个博士生的身份而得与著名的学者合著专书,这当然是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受到肯定之故。方先生在《溪山无尽图》一书中,以风格分析的方法,从空间结构上看出画中群山向画面中景处退让,使画面近景空出一片水域的方式,应属南北宋之间山水画的表现特色,因而将它定为12世纪的作品。

1956年,方先生(26岁)虽然还是一个博士生,但由于在学界和教学方面的表现优异,因此深受普大艺术与考古系主任E. Baldwin Smith教授

普大艺术与考古系担任教授,直到1975年才退休,对培养东亚艺术史博士生的贡献良多。另外,方先生与方太太也利用这次旅行之便,到台湾台中的北沟,参观名画,其中范宽的《谿山行旅》和五代人的《丹枫呦鹿》等作品,特别让他们感动,也令他们深感中国艺术之精致程度与质量之高足可与西方艺术媲美。这更加深了方先生日后专注于中国书画研究的决心与努力。

任教普大

1957年,方先生回到普大,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中国艺术史博士,同时也正式开始他此后40多年的教学工作。那时他才27岁,充满朝气与

2016)、杜希德(Dennis Twichett,1925—2006)、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蒲安迪(Andrew H. Plaks)等著名教授。在图书方面,则包括艺术与考古系的马关图书馆和东亚系的葛士德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后者的中文藏书丰富,在美居于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普大美术馆的东亚艺术收藏也提供了这学程的教学之用。这个学程每年最多只收3名博士生。每个学生都必须以中国(或日本)艺术史为主修,另外必择东亚系的中国(或日本)文学、或历史、或思想史为副修。50多年来,该学程培养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他们毕业后又回到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服务,从事亚洲艺术研究,并培育新一代的学者。

1962年Rowley教授逝世;方先生于是成为普大东亚



幼年即能作擘窠大字的方闻

历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亦然。虽然从文献上看来,中国绘画的研究早已有它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但20世纪初年以来,由于信息与图像的取得逐渐便捷,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曾受到了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刺激与影响。西方艺术史研究已长达200多年以上,多数绘画作品的真伪问题都已厘清,学者可以在那基础上再向前推进,因此研究议题多元,层面深广;但相对的,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许多基础工作还做得不够,比如:在绘画和书法方面,有许多重要传世的作品,我们连它们的真假与断代问题都还未厘清,因此更别说谈到进一步的研究了。由于体悟到这个现状,因此方先生在从事中国书画史的研究时,便特别注重优先处理这些鉴定方面的基础工作。

此外,方先生认为研究艺术史,首先要了解:艺术表现本身便具有它自己的风格发展史。必需具有这样的概念,才能将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在与它相关的风格发展脉络中,寻求它在时间轴线上的定位,也才能解决作品的真伪和断代问题。关于这方面,他曾三度为文加以阐明:如2003年的“Why Chinese Painting is History”(《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又如2013年的“On Chinese Art as History: Seeing and Believing”(《论中国艺术即历史:眼见为真》);再如2014年的“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等。另外,在2004年时,方先生曾应普大谢伯轲教授(Jerome Silbergeld)的专访,以问答的对谈方式,谈论他个人对中国艺术史在本质上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而写成了《我的学术思路:回答谢伯轲教授的九个问题(上)、(中)、(下)》。原文言简意赅,精炼深奥,值得读者细加反思;它可看作是方

先生数十年来研究中国艺术史心得的缩版,学术性极高。

依个人有限的了解,方先生研究中国书画史的具体方法是:融合了西洋艺术史的“结构分析法”(structural analysis),和中国传统的“笔墨鉴定法”,而建构出一套自具特色的断代方法学。由于方先生从小学习书法,因此,对于书画作品用笔的方法极为敏感,也将它视为鉴定中国书画真伪和辨识个别书画家风格的重要方法之一。他曾以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协助艾礼德先生建构了西方最好的书法收藏,此外,他也写过许多专论书法的论文,并强调“书画同体”的概念。又由于接受过西洋艺术史“结构分析”和“风格史”研究方法的训练,方先生在处理中国艺术史的问题时,不仅仅只是横向式地只专注在鉴定某件作品的真伪或断代的问题上,而是在此之前,先纵向式地追究出它的风格渊源和流变。因此,在研究一个问题时,他的思考层面极广,在脑中运转着大量的图像资料,而且贯彻上下古今,所以能见人所未见,掌握到某种风格在艺术史发展中古今通变的特色。这也是他研究艺术史在方法上异于他人的特色。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最令个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以下的五例:Summer Mountains(《夏山图》,1975),“Archaism as a Primitive Style”(《复古主义即原型风格》,1976),“Au-t'u-hua at Tun-huang”(《凹凸画在敦煌》,1981),Images of the Mind(《心印》,1984)和“Along the Riverbank”(《溪岸图》,1999)等。以下个人对这些著作的内容要点稍加介绍,以见它们的重要性。

(一)

《夏山图》是1973年方先生为大都会博物馆从王季迁(1907—2004)收藏中购得的



米芾书法作品
《吴江舟中诗》

(1888—1956)的重视,而被聘任为教师,讲授“西洋中古建筑史”,同时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在人文学科而言,是极为稀有的事。方先生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是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两幅原属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五百罗汉图》原为南宋林庭珪与周季常在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合作的一套百幅作品;每幅画中都表现出五个罗汉显现神通的故事。二战前后,这套作品因种种原因而流散,其中有许多件流传到美国,当时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其中的十幅,而弗利尔美术馆则收藏了两幅。为了彻底了解全套《五百罗汉图》的原貌,方先生除了细研弗利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外,并在1956年到1957年间,得到校方资助,而与方太太二人同往日本京都大德寺,进一步研究并拍摄那些原作。

就在方先生留访京都的期间(1956—1957),他结识了当时在京都博物馆担任研究员的岛田修二郎先生(1907—1994)。方先生十分肯定岛田先生的学问,因此,后来他回到普大后,便向校方推荐。岛田先生因而在1962年受聘到

远见,已经计划和东亚系的年轻汉学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合作,推动“中国艺术博士学程”。由于方先生在研究中国艺术史方面优异的表现,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重视,就连当时最有名的喜龙仁教授(Oswald Sirén,1879—1966),也曾在那时去普大拜访他。1958年,方先生的博士论文获得弗利尔美术馆的重视而予以正式出版: 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罗汉与天桥》)。1959年,方先生与东亚系牟复礼教授共同在二年前开始策划的“中国艺术博士学程”正式成立。1962年,岛田教授受聘普大后,这个学程才扩大成为“中国与日本艺术博士学程”。

这个学程的目的是:结合中国和日本艺术史的作品研究和汉学及日本历史文献研究,来训练博士生。它在资源方面结合了两系杰出的核心教师和图书设备。从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为止,就中国艺术研究而言,在师资方面,先后有艺术与考古系的方先生、岛田修二郎、Robert Bagley,和东亚系的牟复礼、刘子健(1919—1993)、高友工(1929—

2016)、杜希德(Dennis Twichett,1925—2006)、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蒲安迪(Andrew H. Plaks)等著名教授。在图书方面,则包括艺术与考古系的马关图书馆和东亚系的葛士德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后者的中文藏书丰富,在美居于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普大美术馆的东亚艺术收藏也提供了这学程的教学之用。这个学程每年最多只收3名博士生。每个学生都必须以中国(或日本)艺术史为主修,另外必择东亚系的中国(或日本)文学、或历史、或思想史为副修。50多年来,该学程培养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他们毕业后又回到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服务,从事亚洲艺术研究,并培育新一代的学者。

1962年Rowley教授逝世;方先生于是成为普大东亚